

# 文化认同、现代经验与叙述主义

—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关键词

□满 全(蒙古族)

对于蒙古语诗歌创作来说,2011年是一种特殊年份,有探索、有反思,也有焦虑和期待。诗歌是蒙古族文学中的重要体裁,诗歌可以说是蒙古族全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。

从作者、文本、艺术探索方面看,文化认同、现代经验、叙述主义是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三个主题词。

## 文化认同:诗人共同体

身份来自于文化体系。当下世界政治、经济格局中,文化认同是蒙古族诗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。老、中、青三代诗人,从不同立场、不同视角进行诗歌创作,讴歌时代主旋律、反映社会生活,反思人生、宇宙、万物的关系,谱写着艺术传奇。这个时代,诗歌越来越担当起了医疗的、宗教的功能。

虽然每个诗人感悟世界、把握世界、书写世界的方式、视角不同,每个人的诗歌观念、审美追求、艺术风格不同,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、关注的现实是相同的。因此,诗人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共同的追求、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价值标准。换言之,三代诗人的精神纽带尚未隔断,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而诸多诗人共同关注的则是文化生存。因为,文化具有强烈的收敛功能和凝聚民众情感的能力,并向特定方向引导。

从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看,文化认同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。诗人们以不同视角、不同风格的文本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思考。民族文化、传统文化、土著文化自然成为了2011年诗人们备受关注的诗歌话语和诗歌主题。如老一辈诗人阿尔泰的《寻找成吉思汗》、勒·敖斯尔的《八骏颂》、苏尤格的《八骏之歌》等作品,以不同视角书写成吉思汗和八骏,讴歌了永不破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。众所周知,成吉思汗和八骏是富有文化气息的精神密码,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。在现实的困境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,重构民族文化自信,唤起民众的文化认同,诗歌担当着重要角色。文化主义、共同体和地域(故乡)是相互关联的话语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,在蒙古族文坛上相继出现了文化小说、文化诗歌和文化散文,受到民族读者的青睐和好评。

## 现代经验:复杂与骚动

书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、生存困惑、内心世界的作品,在2011年蒙古语诗歌中占居着重要比例。社会转型、文化变迁、现实困境,逐渐冲击着现代人的精神堡垒、价值体系、道德规范和审美追求,一切仿佛

在被重新设计、从头再来的过程中。求变,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标签。因此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蒙古语诗歌着力表现复杂、不安、骚动的现代人的社会心理,记录着时代变迁。蒙古族正在经历着社会现代化、文化变迁的转型时期。

诗歌是生命的密码、社会的敏感神经。现代人的现代经验,在不同诗人笔下有不同的表现。如特·思沁的《诗歌的微笑》一诗,是探索宇宙之源、万物之缘、人生真谛的作品。无限的联想、自由的跳跃、另类的表达方式,让读者深思冥想。特·思沁是富有探索精神的先锋诗人,他追求的是熟悉世界的陌生化表现。从这意义看,特·思沁不是抄写世界的诗人,而是发现世界、创造世界的诗人,他寻找着宇宙万物的内在联系。道日那腾格里的《东京,不相信诗人的谎言》一诗,描写了文化碰撞中的大都市生活,抒发了现代人的复杂、不安情绪。通篇跌宕起伏、气势磅礴,内容庞杂、氛围浓重,表现了诗人对宇宙、人类、文化、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深刻的反思。作品有厚度,有宽度,也有穿透力,是近几年蒙古语诗坛上出现的一篇力作。海日寒的《草原深处的盛夏》一诗,以精练的语言、深刻的思想、浓郁的情感,塑造了完美的艺术世界。该诗虽然书写草原深处的盛夏,但诗人思考的是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。以不同方式发现世界、书写现代经验成为了他近几年的诗歌追求。宝音巴图的《晚点的火车》一诗,以冷漠的叙述方式,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。晚点的火车,隐喻了现代人的现实生活。诗人在冰冷的氛围中叙述了现代人的焦虑、迷茫、不安以及无止境的等待,一切不在原有的规定和期待中出现,相反,一切在无规则、无章法中延续着、存在着。人世间没有承诺,也没有可循的真理,现代人都是等待戈多的人。

现代经验,以复杂、不安、骚动、冰冷甚至荒诞、灰暗为特征,有别于前工业社会的人生经验。随着社会、历史、文化变迁,蒙古语诗歌审美客体正发生着变化,即从传统社会经验的书写向现代社会经验的书写转变,从田园牧歌的抒情向都市喧嚣的叙述转变,从简单、温馨、舒缓的审美品格向复杂、多变、冰冷的审美品格转变。

## 叙述主义:一种可能

在抒情诗中如何处理现代经验,如何运用新的叙述手法,是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的两条探索路径。蒙古语诗歌中叙述主义的盛行,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人和现代经验的书写有关。

其实诗歌是抒情类文学,抒情是它的基本表现手

法。但在诗歌中要表现复杂、不安、骚动、冰冷甚至荒诞、灰暗的现代经验,抒情手法的确力不从心,很难完成。另一方面,能用抒情方式表达出来的平和、舒缓、温馨、优雅的心情,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所剩无几。综观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,以叙述方式,或者冷抒情方式,书写现代经验的作品不少。如乌顺包都嘎的《从死亡般的睡梦中醒来》一诗,以议论、叙述手法,书写了人世间消极、冷漠、灰暗的一面,表达了现代人的复杂经验。该诗放弃了抒情,选择了议论和叙述。齐·那顺达来的《乡村小路》一诗,也放弃了抒情,运用叙述手法,以描写乡村小路的过去与现在,展现了传统与现代、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带来的种种变化。抒情诗中的叙述有别于英雄史诗和小说中的叙述。前者属于内部世界的叙述,后者为外部世界的叙述。

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中有三种表现手法,即抒情手法、议论手法和叙述手法。三种手法与诗歌中描写的情、思、境有关。如抒情主义是遵循情感的逻辑、规则、特点来书写世界,这类诗歌中抒情是基本的表现手法,诗人追求的是情感的抒发。议论主义是遵循思想的逻辑、规则和特点来书写世界,这类诗歌中议论是基本的表现手法,诗人追求的是思想的表达。叙述主义是遵循现实的逻辑、规则和特点来书写世界,这类诗歌中叙述是基本的表现手法,诗人追求的是现实的展现。但是某个作品中混合运用抒情、议论和叙述手法的现象居多。韦勒克、沃伦在其《文学理论》中,把诗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,所谓主观诗人就指抒情诗人,推崇抒情主义的诗人;所谓客观诗人就指叙述诗人,推崇叙述主义的诗人。叙述主义,虽然为诗歌内容的扩展、张力以及处理现代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,但是损毁了诗歌的崇高性、音乐性和情感色彩。

回顾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,可以说成绩斐然,力作诸多,乡村写作、都市写作共存共荣,特别是网络诗歌的异军突起,给民间话语权以及新民间文学的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。



# 成功的金科玉律

—读《穆斯林之子》

□高 深(回族)

我没想到张桂芝写纪实文学,也没想到她写了一位成功的商家,更没想到这部书的主人公竟是一位回族。最早她说写了一本书,让我为这书写篇序文,我多少有一点犹豫。但是当我了解了这三个“没想到”以后,便欣然遵命了。

我用两天多的时间读完了20多页,一直沉浸在敬重与兴奋之中。读罢,我在电话里对桂芝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谢谢你,桂芝!”作为一个回族人,我感激时代造就了一位成功的回族商家,他的成功证实了我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,是一个勇于拼搏并敢为人先的有创新意识的民族。我也感激桂芝熬费数年的时间,为表现一个人的命运与真实人生,表现一个人从小商小贩起步一步一个脚印,最终成为著名企业家的艰辛历程,为此,她做了深入的访问,掌握了主人公一生及商海中起步创业成功的生动素材,熟悉了很多穆斯林的习俗与生活用语,应该说,她也成功地撰写了一部具有时代意义和民族特色的传记文学。

“士农工商,买卖为纲”,“七十二行,商业为梁”。这部书的主人公林长景是很多公司的经理,但在他一长串的头衔中,他总是把“中共党员”放在最前面,我见过许多名片,却极少见过对个人身份、职务如此排列的。

张桂芝说:“共产党员”是他心目中最光荣最神圣的头衔,他认为没有第一个头衔,就不

可能有后面那一长串头衔。仔细想一想,这里面确实有着深刻的道理。

我一页页翻阅书稿,企图找到林长景是怎样从一个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商贩,发展成今天这样规模化的企业群。作者是很智慧的,她写了林长景所以成功的诸多因素,例如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;林长景敢闯、敢“第一个吃螃蟹”、敢于担当风险的勇气;在困难重重、不乏陷阱的商海之中,他那股不服输不气馁不放弃的韧劲……这些都是当年“下海人”共同具有的气质,没有上述这几点,他们就不可能扔掉“铁饭碗”去劈波斩浪。张桂芝独具慧眼,以不厌其烦的笔墨写了林长景两个字的“生意经”,即是“诚”与“信”。所谓成功的金科玉律,概而言之,不外“德义”与“诚信”两端;而单从商业领域而言,“诚信不欺”又在商家伦理与商业道德中处于中心位置。

从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中,就能看出一个商家做人和经商的德性。“锦一顺炸鸡”是辽西的名牌食品,在多个食品博览会上拿过大奖,声名远播。炸鸡的生意很火,可是利润却微薄,有时几乎是“赔本赚吆喝”。炸鸡不



新年伊始,一套精美的书籍——《石一宁自选集》(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)摆上了我的案头。淡雅大方的装帧把我引进了色彩斑斓而又充满书卷气息的内文之中。这套自选集分为评论卷《走向文学新天地》与散文随笔卷《湖神回来了》,反映了壮族作家评论家石一宁写作生涯的一个侧面。细细品读,深深感到这部自选集,是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具视角与个性的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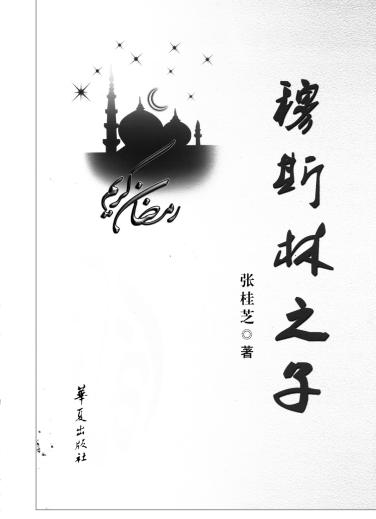
在此之前,曾经读过石一宁的一些叙事与抒情散文,深沉细腻,别具一格,几乎篇篇都是一个美的世界,但展示的不是华艳浮躁的美,而是看似信手拈来、不着痕迹的美的呈现。文如其人,自然平易,真诚坦荡。他的作品,远离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,是思想的涵蓄,也是性情的流露,因此为读者所倾心。

石一宁曾多年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工作,从作家作品的评论到对当代文艺创作诸多现象的研究,他都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。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,观察视角、思维方式、文笔手法各不相同,然而二者又互动交融、相辅相成。石一宁是作家与批评家兼而得之。作为文学创作者,他有理论家逻辑思维的深刻性。作为文学批评者,有着形象思维的宝贵体验,不仅成就了自己,也让更多写作者深深受益。他是用心血浇灌着自己的作品,两卷自选集作品正是他多年来心血的结晶。

散文随笔卷《湖神回来了》充满诗意的书名,是对全书既流贯诗情,又充盈理趣的风格特色的极好概括。其中一部分内容,反映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,作者走访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大家,将见闻与感触成文,将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,展示给读者。作者所写的这些文艺名家颇有代表性,在某种程度上映现出新时期文坛艺苑的一个侧影。文如其人,书如其名,在浮躁的当下生活中,读一读这样的散文随笔,是美感的享受,性灵的洗涤。

评论卷《走向文学新天地》辑录了作者对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作品的评析。无论是享誉文坛的大家,还是初出茅庐的新秀,他都以一个文坛同道者的真诚,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,娓娓道来,入情入理,剖析精辟。从不虚意奉承,更不恣意捧杀,或正面铺陈,或横斜逸出,褒贬宽严适度,行文从容不迫,真知灼见动人心弦。这是其文学评论的特色。

这本自选集两卷50多页,只是从作者创作与评论作品中筛选出的一部分,这也体现了作者坚守精益求精、质量至上的高标准和对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。这种精神让人可以期待在未来的岁月中,继续读到作者更多的锦绣篇章。



是没有扩大利润的空间,有人给他算过账,只需把一换就制作料改成周一换,就可以增加几成利润。林长景拒绝了。在他的心目中,诚信比金钱重要,有时诚信本身就是一个商家的终生财富。

我想林长景血管里除了流着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血液外,还有回族人民伦理道德及伊斯兰教义的熏陶。

我国古代是重农轻商之国,经商历来被贬为“末业”,封建王朝一向奉行“强本抑末”政策;商贸企业只被视为贩夫走卒、市井小民的事,正统文人自然不屑于记述商事,所以流传下来的实质性、具体性的商贸文字材料很少。

只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,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,才渐渐出现了一些有关商贸的书籍,仍内容乏困,流传不广。锦州历史悠久,商贸历来发达,是辽西的商贸重镇,但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极少,且多为“行商秘诀”一类,很少记录实业家的兴衰,更无全市或一地、一家企业整体发展轨迹的记载。当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之际,比较全面地写一个商贸企业的发展史,为一位商贸企业家立传,其意义非同小可。或许再过若干年,人们回首远望这段历史时,会对这本书产生更大兴趣,将成为研究锦州乃至辽西民族商贸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见证。

因此说,桂芝作此书,或许比一部诗歌、小说更具有历史价值。

# 有修改空间的好书

—读白族作家李树华长篇小说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

□普 飞(彝族)

经历和当代正经历着打工之路的农民。祥云县不仅历时上有人走夷方,如今也像全国许多农村一样也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。祥云县还有以胡子龙等为代表的一群农民作家。

现为祥云县文联主席的李树华的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一出版,胡子龙便召开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长篇小说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创作得失三人谈。参加座谈的三人一致肯定了小说取得的成绩,他们为祥云作家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而高兴。当然也指出了小说存在的缺陷,首先是因为作者李树华原先是写散文的,现在第一次写小说,散文化的情节太多,主要人物不鲜明、不突出。再是由于作者可能长期

听了其大伯李观生讲述缅甸的缘故,作者对缅甸的有关知识很丰富,但不得通过小说中的每个人物之口把缅甸的故事都讲给读者听,以至让各个人物都讲了一些缅甸的事。这就在小说中导致记事的堆砌,削弱了人物形象,也妨碍了情节顺利发展。

三人谈对这部小说得失的分析,我也有同样感觉。我与他们三人稍有不同的看法是:三人都认为作者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长篇,是由于他获得了一个优势性题材。我却认为这题材给了作者一个恩格斯说的“典型环境”。有这个典型环境,就要像恩格斯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样,应当努力塑造吴温吞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,让其形象活灵活现又顶天立地的站立起来。

作者对吴温吞的原型李观生很熟悉,对缅甸历史的现代的知识也很丰富,如果《漂泊缅甸的日子》有机会再版的话,作者是有能力把作品改好的。明知作品有缺陷却因为作者生活积累不足而感到无法修改,那才是可悲的。有修改空间的书就是一本好书。

## 精神旅途中的抒怀与向往

□蔡劲松(侗族)



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,似乎正被铺天盖地的时尚和新潮所席卷。当人们过度依赖于网络、微博和摄影,一味沉浸于高技术、快节奏、高效率的时候,以诗歌为精神内核和重要表征的文学艺术,看似越来越边缘化,被世俗世界遗弃了。然而,一个成熟的社会,必然要在其革新的阵痛中,历经原有文化系统的结构整合与分化,必然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以及文化创造的过程中,展开对人类精神特质空间的深层追问与探寻——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境界与道悟、信念与情感,将成为精神存在的境界与道悟、信念与情感,将成为精神存在的境界与道悟、信念与情感。

当我读到侗族诗人吴基伟的诗集《踏歌行》时,更加坚信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。基伟出生在贵州天柱县一个偏僻的侗族山村,1994年大学毕业后,从三线企业的一名钳工干起,经过十多年基层企业管理岗位的历练,最后调任重要岗位,丰富的履历和突出的业绩促成了他人生轨迹的跃升。在我与吴基伟的接触中,我常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诗性与真挚,感受到他超凡脱俗的那一面。尽管他的工作性质很繁琐,他也十分投入那份肩负责任与使命的事业,但他的生命中好像从来没有远离过文学,没有离开过审美的视界。

吴基伟曾向朋友们讲述,他的家乡是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村寨,很早以来家家户户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,几乎每家都培养出了大学生。他们村子里,过年时每家门口的春联内容都是自家编撰的,并且常常是家中的小学生写的,虽然写得有点歪歪扭扭,却别有一翻趣味。那时每到春节,走村串户拜年的時候,父母就会让他拿个小本本,抄写各家春联的内容,回家后再细细品读比较,看谁家的